

历史·文化

对东正教两大常识的误读

[日]松里公孝 阎德学

【内容提要】“东正教是国王兼教宗的宗教”“俄罗斯正教会和世俗政府想把莫斯科变成第三罗马”这两种说法似乎成为人们的常识，但二者均没有教义上的根据，“莫斯科=第三罗马”更是违反了大公会议决议。彼得一世进行教会改革以来的两个世纪间，俄罗斯正教会被置于世俗权力的直接管理之下，还协助维系了苏维埃政权，因而受到“俄罗斯正教会是国王兼教宗制度”的质疑。但俄罗斯正教会并不承认上述两种说法，2000年发表的《俄国正教会的社会概念基础》就旨在消除世人的这一疑虑。俄罗斯正教会并不是利用世俗权力的帮扶而获得权威性和正统性，否则世俗权力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正教会的分立与管辖区域的划分，与世俗国家的国界未必一致，这是国王兼教宗制度难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东正教 教宗制 第三罗马 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B9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8)05-0114-0015

【作者简介】松里公孝，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阎德学，历史学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中心研究员。

对于一般人来说，“东正教是国王兼教宗的宗教”“俄罗斯正教会和世俗政府想把莫斯科变为第三罗马”这两种说法已经成为常识，被多种语言载入维基百科当中，甚至在日本还被写进高校的教材当中。但与此同时，亚历山大·施梅曼（Alexander Schmemmann）、唐纳德·W. 特里德戈尔德（Donald W. Treadgold）、德米特里·奥波兰斯基（Dimitri Obolensky）、约翰·梅延多夫（John Meyendorff）等教会史的专家，则多次表明对上述两种说法的批判态度^①。为什么在此问题上，社会大众的共识与教会史专家的观点会有如此巨大的背离呢？

一、东正教在教义层面上的分界线

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世界经历过三次大分裂，分别是451年迦克墩大公会议上的分裂、8—11世纪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裂以及16世纪天主教与新教的分裂。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分裂画出东正教在教义层面上的分界线。

一般来说，在宗教信仰里，先知的身份非神即人，两者必居其一。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是“行走在街市上”的普通人，他既不主张自己是神之子，也不用神迹作为幌子。而基督教的先知——耶稣则被认为既是神又是人，这种认知成为基督教特有的活力之源，也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如果耶稣仅仅是个凡人，就无法解释处女受孕和复活之类的非科学现象及其创造的种种奇迹；如果他单纯是位神，那么他为人类所承担的一切罪恶，在经历酷刑和被钉在十字架上极度痛苦死去的恩泽也就淡化了。所以在早期的基督教中，基督教论（Christology），即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成为最大的争论点。从4世纪到8世纪召开过的7次世界大公会议，除去最后一位的第二尼西亚大公会议（主要是讨论破坏圣画像的问题）之外，其余6次会议全都纠结在此问题上。

迦克墩大公会议暂时做出了决议，结论采用了这样一种说法：耶稣身上的神性和人性并未融合在一起。于是，不同意此说的教徒便分离出去，形成了后世的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叙利亚东方正教会（反迦克墩派）以及科普特教会等。虽然

^① Alexander Schmemmann, *The Historical Road of Eastern Orthodoxy*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3), pp. 164-168; Donald W. Treadgold,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Belmont, MA.: Nordland Pub., 1979), p. 81; Dimitri Obolensky, *Byzantium and the Slavs*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94), pp. 98-103; John Meyendorff, *Rome, Constantinople, Moscow: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3), Ch. 8.

正统的东方正教会曾将反迦克墩派称为“单性论派”，但由于该称谓是曲解了他们教义的标签，所以在推进与反迦克墩派的历史和解进程中，如今的正统的正教会已不再使用这一称谓了。在日本学者松里公孝看来，迦克墩大公会议上的定论，与其说是在教义上探究的结果，不如说是被拜占庭皇帝的介入、安提（叙利亚）教会和亚历山大（埃及）教会的角逐、罗马教会主张严格区分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等诸多因素绑架的政治性决定，因而并不具备正当性。此后，罗马天主教也脱离正教会，东正教的领导层开始幡然醒悟，“原来迦克墩大公会议是失败的，把不是异端的人当成异端并赶跑了他们。与罗马天主教相比，单性论派更接近东方正教的教义”，这种反思代代相传。

继俄罗斯正教会1961年加入世界基督教联合会（WCC）之后，又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加入该组织，东正教和反迦克墩派的和解自此有了进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双方和解的进程加快了，像中东教会与俄罗斯、亚美尼亚教会之间关系的改善。叙利亚安提牧首区普世教会运动局长萨梅尔·拉罕（Samer Laham）指出：中东面临着诸如巴勒斯坦难民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极少数的基督教徒却在为“基督身上的神性和人性”等对于现代人来说无关宏旨的问题闹分裂，这是极为愚蠢的。中东地区的基督教各教派多达两位数以上，倘若还不能共享圣礼的话，会给基督教徒的婚丧嫁娶带来诸多不便。俄罗斯正教会和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和解，实际上自沙皇俄国时期的普世教会运动就已开始着手了，所以苏联解体后的新动向不过是该和解进程的重启。当发生卡拉巴赫战争之后，双方的和解便成为在精神上对两国的强有力支持。因为其他一些教派，譬如叙利亚正教会（反迦克墩派）尽管在教义上与亚美尼亚教会接近，却不能在卡拉巴赫战争中支持亚美尼亚，所以与俄罗斯正教会的和解对于亚美尼亚而言，具有关乎国家存亡的重要意义^①。

我们知道，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裂，存在着教义、政治（帝国）、教会三方面的问题。从教义层面上看，罗马天主教在强调耶稣（圣子）的独立性上有很强的倾向。东正教认为圣灵是从父=神中产生，而天主教却认为圣灵是从父与子两者之中产生，这种倾向成为分裂的原因之一。从政治层面上看，罗马教皇于公元800年将西罗马皇帝的皇位授予查理曼，该事件成为政治上分裂的标志。在封建

^① 松里公孝于2010年3月18日同叙利亚正教会（反迦克墩派）阿勒颇主教的面谈。

社会，各宗教的势力范围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世界只能有一个皇帝。如果伊斯兰世界存在两位以上的哈里发，中华儒教文化圈出现两位以上的皇帝，一定是悲剧性的异常事件。然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却出现两位宗教领导人（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和罗马教皇）以及两位皇帝并立的局面。当然，认为这类异常事件应该被避免的观念也一直延续到拜占庭帝国灭亡的15世纪。从教会层面上看，天主教形成以罗马教皇为最高领袖的集权性官阶制，而东正教无论是在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上，还是在地方教会的内部运营上，均采取集体协商的原则，因此，随着时代的推移，两大教会之间的再度融合已然不现实了。

二、拜占庭共同体在地理层面上的形成

我们知道，东正教世界也被称为拜占庭共同体。所谓“共同体”，具有如下含义：到10世纪之前，拜占庭帝国意识到从领土上收回东罗马帝国已没有可能，所以一直借由软实力来聚合东欧诸多族群而构建帝国。拜占庭共同体（东正教世界）大体上是由原来的拜占庭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构成。除去巴尔干地区，旧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已被完全伊斯兰化，所以为了让东正教得以延续，借道古罗斯加以传播这件事的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条途径，东正教或许会沦为一个规模不过与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叙利亚教会（反迦克墩派）程度相当、使用希腊语的民族教会了。

古罗斯建立于9世纪。在此之前，拜占庭帝国一直在强化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为防止亚欧大陆中部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对帝国核心地区的入侵，有必要构建一条由里海延绵至黑海的防线。为此，拜占庭帝国驯服了阿巴兹格人（今天阿布哈兹人的祖先）和阿兰人（当今奥塞梯人的祖先），传播东正教。这条防线同时也阻挡了伊斯兰教的北上。737年，由哈扎尔、拜占庭、阿巴兹格组成的联军迎击倭马亚王朝的阿纳科普战役，堪与早其5年的普瓦提埃战役相提并论^①。若是法兰克人在普瓦提埃战役中落败的话，很难想象其后的欧洲会是怎样的格局；同样，若是穆斯林在阿纳科普战役中获胜的话，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地区会是怎样一番面貌。松里公孝特别强调，阿布哈兹的国家认同不是通过宗教，

^① D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 p. 172.

而是通过一些根深蒂固的家庭关系和历史形成的行为规范得以维系。阿布哈兹人以功利性、工具性以及折中主义来对待宗教。其官方认为,阿布哈兹的宗教历史分为前基督教阶段、基督教阶段(14—15世纪)、伊斯兰教阶段(15—19世纪)、伊斯兰教基督教并存阶段(19世纪后半期到1993年)以及现在的基督教主导阶段(1993年以后)。在阿布哈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留着许多异教徒的传统。阿布哈兹人对待宗教的这种工具性特征的典型例子是在18世纪时一些“阿布哈兹土著居民”为摆脱“拜占庭的控制”而皈依伊斯兰教。这种改变宗教信仰的现象在今天更加普遍。独立战争之前,大多数阿布哈兹人宣称自己是穆斯林或异教徒,完全是由于当时的东正教把他们作为格鲁吉亚化的工具,而一旦阿布哈兹人创立自己的东正教主教管区之后,即使还未被承认,但由于被同化的威胁已经消除,他们又重新改宗基督教^①。

历史上,由于穆斯林在8世纪获得地中海的制海权,为开辟一条新的连接欧洲与拜占庭帝国的通商路,形成了通过涅瓦河、伏尔加河、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等河流来连接波罗的海和黑海的通道。这条新通商路有时与诺曼人的迁移路线重叠,以这种通商经济为背景,诺曼人与斯拉夫人的联合国家即基辅罗斯国诞生了。虽然基辅罗斯于860年攻打过君士坦丁堡,强烈震撼了拜占庭帝国,但在14年之后,基辅罗斯却与拜占庭帝国缔结和约,接受了最初的大主教。其后,在经历异教徒回迁之后,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大约在988年最终皈依了东正教。与地理上距离君士坦丁堡很近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不同,由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国王僭称自己为皇帝,遭到拜占庭的军事惩罚,而古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因此古罗斯的大公没想过要给自己加上皇帝的封号。与此同时,拜占庭皇帝把君士坦丁堡教会基辅全罗斯主教当成唯一的斡旋者=帝国官吏来对古罗斯施加影响力,可以说是通过纯粹的软实力进行统治。这种方式在蒙古人的统治时期也有着重要意义。12世纪,鞑靼人称霸黑海北岸,阻断了波罗的海与黑海的通商道路。此外,在这个充斥着十字军与意大利商人频繁活动的世纪,欧洲从某种程度上收回了地中海的制海权,于是依赖河道交通的基辅罗斯王朝衰退了。

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建立了拉丁帝国,1223年到1240年,

^① [日]松里公孝:《未获承认地区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的政治认同:东正教内部关系及跨界少数民族问题》,载《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2期。

蒙古帝国践踏了南东欧以及古罗斯，但这两件事并未削弱拜占庭共同体，反倒赋予其新的生命。学界一般认为，是蒙古帝国又把拜占庭帝国的寿命延长了200年。事实上，在消灭威胁拜占庭的塞尔柱帝国、打击在圣俗两方面都强烈要求摆脱拜占庭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保护热那亚商人的欧亚贸易、阻止罗马天主教势力即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和波兰人进入古罗斯等若干问题上，两帝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甚至在统治古罗斯问题上，两帝国都找到了共同利益。在松里公孝看来，对于将大本营设在里海北岸萨莱的金帐汗国来说，其对君士坦丁堡教会基辅全罗斯首府主教区垂青有加，因为该主教区在诸多公国林立的俄国，是囊括喀尔巴阡山脉至乌拉尔山脉、大诺夫哥罗德至里海的唯一行政组织。倘若金帐汗国仅仅通过古罗斯对自己的进贡以及操控公国间的争斗来支配古罗斯，那将是一种不稳定的局面。为了整合古罗斯，尊重对西部天主教起到屏障作用的东正教，14世纪之后，基辅全罗斯府主教堂迁到莫斯科城，即便金帐汗国被伊斯兰教化，也没有变化。对于君士坦丁堡教会来说，与其听从亲近天主教势力的立陶宛大公的请愿，采取建立古罗斯第二首府主教区这种策略，不如让置于金帐汗王国支配下的基辅全罗斯首府主教区继续单独管辖古罗斯，显得更为安全。如此一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与金帐汗王国的圣俗二重统治体制便应运而生，这与欧洲的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圣俗二重体制有着形态上的类似。金帐汗国的首都萨莱，不仅作为斩断莫斯科与特维尔大公之间倾轧的舞台，也是古罗斯各大公向金帐汗国谄媚的场所。1261年以后，东正教的主教堂设在萨莱，古罗斯、金帐汗、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宗教外交在此蓬勃地展开着^①。

三、“第三罗马”，还是拜占庭共同体

把莫斯科变为“第三罗马”，是对大公会议特别是对迦克墩大公会议决议的露骨践踏，因此正统的正教会不可能提出这种主张。倘若任性为之，必将被正统的正教世界驱逐（像古仪式派那样被完全放逐的话，便自嘲般地沉溺于这个说法）。“第三罗马”的论调，从其最初倡议者普斯科夫修道士开始，皆是纯粹的个人主张。

^① Meyendorff, *Byzantium*, pp. 44-46. [日]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長いその後」、『興亡の世界史9』講談社、2008年。

要想在最小限度违反教会法的同时，成功地把莫斯科变为“第三罗马”，唯有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本身做出决定，把大本营从伊斯坦布尔迁移至莫斯科城，并召开大公会议或是与其规模相当的会议，让全世界的东方正教会都予承认之后才名副其实。

俄国人仅有两次机会进行尝试。第一次是1588年普世牧首耶利米亚二世访问俄国时，当时的莫斯科大公国政府向普世牧首建议，与其回到伊斯坦布尔被穆斯林管理，不如永远留在弗拉基米尔。耶利米亚二世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但却承认了1448年以后事实上独立的莫斯科教会总主教会的地位，而且予其正教世界第五的席位。假设俄国人觊觎“第三罗马”，他们应该提出：“为什么才第五位！比起你们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我们教会的地位不是应该排在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前面吗？”俄国人当然没有提出此主张，由于格鲁吉亚和基辅罗斯东方正教会的历史更悠久、更具较高权威，而普世牧首却无视它们，直接将第五的位次赋予俄国人，因此俄国人很是欢天喜地^①。第二次尝试是在1948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强力推动此事，但由于世界处于冷战状态而最终失败^②。

就算现实中普世牧首区迁移至莫斯科难以办到，但宗教领导人在私人信件中表明自己已经是正教世界的实际领导者而自称“第三罗马”，这种事情有可能吗？我们的答案是，只要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已经软弱堕落，并且是危机重重的这种看法没能在整个正教世界形成共识，那么这种事情也是不可能的。虽然世人常常会误解，但是“第三罗马”论的出现，并非因为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帝国消灭，而是为了抗议在拜占庭末期，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企图借助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协议（普世教会运动）于奥斯曼帝国的攻势下自保的软弱堕落行为。如果普世牧首没有沉溺于普世教会运动，那么俄罗斯教会应该倾尽全力帮助在拜占庭帝国末期及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苟延残喘的普世牧首吧。所幸的是，奥斯曼帝国并未采取压制东正教的愚蠢行为，反而帮它重建普世牧首区和正教世界，将其作为实现对巴尔干的统治以及助推对欧政策的道具。也正因为如此，初露端倪的“第三罗马”论才草草收场。

① John Meyendorff, *Rome, Constantinople, Moscow: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96), pp. 137-138.

② Mikhail Shkarovskii, "Stalianskaya religioznaya politika i Russkaya Pravoslavnaya Tserkov' v 1943-1953 gg., *Acta Slavica Iaponica* 27, pp. 1-27.

到了19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曾经作为普世牧首区庇护伞的奥斯曼帝国也已四分五裂，于是又有人开始议论纷纷，是谓“第三罗马”论卷土重来的背景。受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在俄罗斯正教会的宗教活动家中，许多人主张支持保加利亚正教会等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独立出来。但是，这种主张受到来自俄罗斯正教会内部的批判，“倘若格鲁吉亚正教会也开始提出同样的主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因此，这类主张没能成为主流^①。

四、“国王兼教宗”抑或“和谐交响曲”

正教会自身并未采用所谓的国王兼教宗制度作为教义和方针。在东正教中，规定教会和国家关系的用词是“和谐交响曲”（和声，即圣俗分工与协作的意思）。这同天主教的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和谐交响曲”一词由6世纪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首先使用，在10世纪被写入利奥六世时代编纂的《巴西尔法典》。由于这部法典有关部分的起草人是弗提乌斯普世牧首，因此作为教义被采用了。这部法典在其后规定斯拉夫裔各族群的东正教关系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尽管国王兼教宗制度并不是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法规，但是俄罗斯正教会确实发生过不得不称其为“国王兼教宗”的案例。第一次是1722年彼得一世发动教会改革，结果是莫斯科牧首区被废止，其后的200年间一直到二月革命，俄罗斯正教会都处于一个名为宗教事务局的世俗机构的管理之下^②。第二次是1927年，苏联国内的俄罗斯正教会最高领袖谢尔盖（斯特拉戈洛德斯基）发出呼吁，要求信众支持苏维埃政权。

1722年的教会改革发端于彼得一世游历欧洲之际，受到新教徒的国家宗教制度的吸引。尽管俄罗斯这套宗教事务管理体制存在了近两个世纪，但终究缺乏正当性。1905年革命时期，希望重建牧首区的呼声甚至在许多主教当中蔓延^③。

^① Paul Werth, *Georgian Autocephaly and the Ethnic Fragmentation of Orthodoxy*, *Acta Slavica Iaponica*, Tomus 23, 2006, pp. 74-100.

^② James Cracraft, *The Church Reform of Peter the Grea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

^③ John Meyendorff, *Russian Bishops and Church Reform in 1905*, Robert L. Nichols and Theofanis George Stavrou, *Russian Orthodoxy under the Old Regim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8), pp. 170-182.

处于主教公会制之下的两个世纪对俄罗斯正教会来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以至于2009年7月基里尔牧首访问基辅期间，仍要在电视辩论中极力批判彼得一世的教会改革，认为其试图引进“对俄罗斯来说是异质的、西欧绝对主义的模型”^①。

作为1917年二月革命的一个成果，莫斯科牧首区终于得以重建，但是它却再度受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压制。在1925年吉洪（别拉文）牧首去世后，布尔什维克政权不允许召开推选继任牧首的地方公会议。1927年，正教会意图秘密召开地方公会议并选出新牧首，此事被执政当局获悉，结果，在执政当局的威胁下，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谢尔盖（斯特拉戈洛德斯基）宣言。在宣言中，谢尔盖不仅仅向苏联人民，甚至向流亡海外的俄国人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支持苏维埃政权。这种向史上渎神政权屈服的投降主义被称为“谢尔盖主义”，直接导致国内出现地下教会，在国际上也造成与境内外俄罗斯正教会的分裂对抗。可以说，相较于发生在久远的中世纪或近代的种种案例，如今批判俄罗斯正教会是“国王兼教宗”制度的人们，更多的是对“谢尔盖主义”耿耿于怀。而另一方面，渎神体制留给那些希望至少要坚持个人信仰的人们的选择空间并不大。苏联的俄罗斯正教会和社会主义波兰的天主教会之间的形态并无多大差异。

我们知道，1943年，苏联为了在苏德战争中动员人民，推行与国内各宗教教派间的和解政策，甚至允许俄罗斯正教会召开地方公会议选举牧首。而另一方面，出于对格鲁吉亚的绥靖政策，又强迫俄罗斯正教会承认1917年单方面发表独立（autocephaly）宣言的格鲁吉亚正教会。缓和时期，俄罗斯正教会极大推进了事实上的独立自主。其核心人物是1960年至1972年间担任各教会关系局局长的尼科季姆（罗托夫）。在其领导下，俄罗斯正教会在对待普世教会运动的问题上实现了大逆转，从严厉批判转向积极推进，并于1961年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社会主义国家的正教会也紧随其后，至此，作为新教徒组织的WCC演变成新教·东正教组织，向真正的普世教会运动迈进了一步。作为后辈的基里尔（现俄罗斯正教会牧首）和菲拉列特（杰尼先科，1991年背弃俄罗斯正教会，不久后成为基辅牧首区的牧首）自不必说，就连同龄人阿列克谢（后来的阿列克谢二世）也被称作是尼科季姆的弟子。总之，在尼科季姆的领导下，涌现出一群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в прямом эфир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телеканала «Интер», 28 июля 2009 г.,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706055.html>

风格强硬的宗教政治家，他们同虽具有高尚品格却不懂政治的吉洪和谢尔盖等人截然不同。1978年，年仅49岁的尼科季姆在做弥撒时，因心脏病发作客死梵蒂冈，有人将此事注解为激进的普世教会运动遭到了神的惩罚。如同《教父III》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两周后，教皇约翰·保罗一世也因为几乎相同的原因猝死，又谣传他们被同一个人下了同一种毒。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正教会真正恢复了自主性，于2000年发表了《俄罗斯正教会社会性概念的基础》一文，规定了教会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合理关系。文中写道：国家不应当介入教会生活及其运作、教义、礼仪、宗教戒律等。教会以法人身份活动，因而除了同国家及其立法、权力机关不可避免地存在关联的领域之外，遵循教会法而进行的普通教会活动国家也同样不得介入。教会期待国家尊重教会法的规范及其内部法则^①。

五、正教会的分立与管辖领域的划分

尽管时常会被误解，但是我们知道，世俗国家的独立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保证正教会的独立。当今世界有15个正式的正教会，然而东正教徒人数占据国民多数的国家却远远多于这个数字。这表明仍有很多国家，譬如白俄罗斯与摩尔多瓦，虽已经取得政治独立，但仍未获得教会的独立。罗马尼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于1878年就在柏林会议上获得了承认，然而罗马尼亚正教会的成立却在1925年。在拜占庭帝国末期，基辅全罗斯首府主教区反对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牧首区的普世教会运动倾向，并于1448年召开地方公会议，改名为莫斯科首府主教区，从而在事实上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实现了分离。直到1589年，君士坦丁堡教会才承认莫斯科首府主教区的地位，并将其升格为牧首区。也就是说，到与曾经的母教会达成和解，莫斯科首府主教区实际上经过了141年之久。

东正教中教会分立之所以异常困难，是因为需要具备集结一定数量的主教与教区这种必要的资格条件。正谋求独立的黑山和马其顿并不符合这些必要条件，但又希望获得母教会对其独立的祝福（承认）。在资格条件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

^①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III. Церков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http://www.mospat.ru/ru/documents/social-concepts/iii/>

全部正式的正教会不但不会认可这类僭称教会，还会孤立它们，其圣礼也被视为无效。实际上，虽然并不存在那种在基辅牧首区受过洗礼的人，因各种理由进入俄罗斯正教会后还被要求重新受洗的情况，然而“即使让孩子在那个教会接受洗礼，他也不能成为基督教徒”“即便在那个教会举行婚礼，也不被认为是基督徒的婚姻”“即使在那个教会举行过葬礼也去不了天国”等诸如此类的论断，对阻止信徒前往非正式的教会仍具有十足的威吓作用。

东正教世界的这种保守性，与世俗外交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塞尔维亚或是巴基斯坦尚未得到承认之时，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孟加拉国的独立，或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却不承认阿布哈兹的独立。然而，诸如此类的双重标准在东正教外交中很难出现。由此或可断言，东正教外交要比世俗外交更具道德感，若是再考虑到恰恰是因为国际社会对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独立的承认而导致南斯拉夫陷入冲突泥潭这一点与“考虑”杂糅。那么可以说东正教外交更具有和平倾向。这种保守性特征虽然亦因教会法方面的规定使然，但其产生的真正主因还是在于大多数的正教会自身内部也存在着分离主义的势力，所以很难对其他教会的独立予以声援。翻开东正教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客观的教会独立的标准。岂止如此，独立往往都是采用充满痛苦的方式，经过一定的时间，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再向母教会摊牌，最终获得承认。俄罗斯正教会也是使用这个方法得以从君士坦丁堡教会中独立出来的。格鲁吉亚正教会甚至是杀害俄罗斯正教会的司祭而僭称独立的。即便如此过格，在斯大林的干涉下，俄罗斯正教会不也是在1943年承认了格鲁吉亚正教会的独立了吗？如果一件事已然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目的，这件事还会有什么错呢^①？

我们看到，谋求独立的教会经常使用的理论就是，独立是为了恢复已经失去的正义。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宗教是教条式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被歪曲的正义常常会得到恢复。举例来说，格鲁吉亚正教会在东格鲁吉亚（姆茨赫塔）被沙皇俄国吞并后不久（1811年）即被俄罗斯正教会合并。作为对格鲁吉亚正教会的补偿，俄罗斯正教会授予第比利斯督主教的崇高地位，其地位甚至超过基辅和喀山教区。然而1905年革命之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兴盛，恢复独立成为格

^① Kyivs'kyi patriarkhat - pomisna ukrains'ka pravoslavna tserkva: istoriko—kanonichna deklaratsiya (Kyiv, 2007); 松里公孝 2009年12月28日在基辅同 Evstratii (Zorya) 基辅总主教信息出版局局长面谈。

鲁吉亚宗教领导者的夙愿。1917年僭称独立的格鲁吉亚正教会虽未得到俄罗斯正教会的认可，但最终还是于1943年获得了承认。由于这只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所以全世界的正教会对格鲁吉亚正教会的独立均不予承认，格鲁吉亚正教会一直保持着半承认状态。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格鲁吉亚正教会伊利亚二世与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牧首展开谈判，最终于1990年做出了决定——“格鲁吉亚正教会自5世纪后一直就是独立教会”。决定溯及1811年，指出当时俄罗斯正教会对格鲁吉亚正教会的吞并其实是对教会法的违背，从而意味着吞并举动完全作废。据传，原本的格鲁吉亚正教会的领地曾是“最初的使徒”安德烈和“奋锐党”西门布教之地，因而获得使徒教会的荣誉。

由一个半承认教会成为使徒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这种华丽的名誉恢复，也刺激着其他未被承认的教会，他们期待着同样的事情也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如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主张要复活中世纪的Pizunda主教和阿兰教会，基辅牧首主教区也宣称14世纪基辅首府主教区移往莫斯科是违反教会法的。可是，“恢复正义”这一主张的弱点在于它会使得母教会丧失颜面，进而导致母教会变得更为顽固不化。譬如，若是14世纪基辅首府主教区向东北罗斯迁移本身违反教会法的话，那么承认今天的基辅牧首主教区的独立，就意味着对俄罗斯正教会整个历史的全盘否定。恐怕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基辅牧首主教区才一直保持缄默的。

我们知道，苏联和南联盟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后，均产生了大量的正教会分立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置乌克兰正教会的分裂、摩尔多瓦教会究竟应该归属俄罗斯正教会还是罗马尼亚正教会、爱沙尼亚的东正教徒应该归属莫斯科牧首主教区还是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既绝不从属于格鲁吉亚正教会又不被俄罗斯正教会所接纳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东正教徒将何去何从、主张从塞尔维亚教会中独立出来的黑山和马其顿正教会该怎样处理等等。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准备召开泛正教会会议。但是，普世教会似乎是为了缩小俄罗斯正教会的管辖范围，才提出“无需亲国祝福”这一新方针的，俄罗斯正教会势必拼尽全力反对，所以很难想象普世教会的想法能够顺利实现。

正如众多的主权国家与其国内的正教会不可能同时实现独立一样，正教会的管辖区域也未必与世俗国家的国界相吻合。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就东正教政治而言，正是因为世俗国家的国界与正教会管辖领域不同才更具重要意义。松里公孝

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格鲁吉亚正教会通过与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以及土耳其政府的交涉,把土耳其东北部的塔奥地区(历史上曾归属南格鲁吉亚)作为格鲁吉亚正教会的管辖地域。但这一地区几乎完全伊斯兰化,正教会之间管辖界线的变更实际上已失去意义。不过,对格鲁吉亚正教会而言,能够在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土之外拥有一块“教会法规定的领域”是非常必要的。在松里公孝看来,以斯大林划分的界线为基础,主张“教会法规定的领域”不可侵犯,并以此批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教务上的分离主义,是一件可笑而滑稽的事情。

通过对“东正教=国王兼教宗”制度和“莫斯科=第三罗马”这两个命题的探讨,我们对东正教政治与俄罗斯正教会的特征进行了研究。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二者均没有教义上的根据,“莫斯科=第三罗马”更是违反了大公会议决议。其次从史实上看,彼得一世进行教会改革以来的两个世纪间,俄罗斯正教会被置于世俗权力的直接管理之下,后来还协助维系了苏维埃政权,为此不得不承受“俄罗斯正教会难道不是国王兼教宗制度吗”这样的质疑。2000年发表的《俄国正教会的社会概念基础》旨在消除世人的这一疑虑。而“莫斯科=第三罗马”则毫无历史事实依据,给人的印象是一种“广为传播”的普遍常识,之所以得以传播,是因为那些批评俄罗斯正教会的人们不厌其烦地盲目引用罢了。俄罗斯正教会是具有使徒继承性共同体的一部分,的确显示出权威性和正统性,但它并不是利用世俗权力的帮扶而获得这一权威的。如若一种宗教必须依附世俗权力才能获得权威,那么对世俗权力而言,它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最后,通过探讨正教会分立与管辖区域划分的问题,得出东正教与世俗国家的独立、国界线未必一致的结论。东正教必须在世俗政治面前保持自律,而这正是国王兼教宗制度难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如果把新教徒的国家教会视为与主权国家体系同时产生,且二者形成双胞胎般的关系的话,那么,东正教就是诞生于罗马帝国,并始终作为帝国宗教而存在至今的宗教。

(责任编辑 靳会新)

Неверная трактовка двух важ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Кимитака Мацузато (Япония), Янь Дэсюэ

【Аннотация】 “Православие - кесарепапская религия”,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с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 хотят сделать Москву Третьим Римом” – эти два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кажутся здравыми, однако оба они лишены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более того, концепция “Москва = Третий Рим” нарушает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селенских соборов.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вух столетий после проведения Петром I церковной реформы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была подчинена с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а также оказывала поддержку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что ставит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заявл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 кесарепап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Однако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не признает эти два заявления, так целью принятого в 2000 г.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стало устранение этих сомнений. Для обретения авторитета и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не использует помощь с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теряется ценнос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Несовпадение каноническ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Церкви с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и границ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ой причиной, затрудняющей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кесарепап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папство; Третий Рим; Россия

A Misreading of the Two Common Sense of Orthodox

Mztsuzato Kimitaka, Yan Dexue

Abstract: The following two statements such as “Orthodox is the religion of the king and Pope” and “Russian orthodox and secular government want to turn Moscow into the Third Rome” seem to be common sense. However, neither of them has the basis of doctrine. The parlance of “Moscow is the Third Rome” is even more contrary to the Ecumenical Council. For the two centuries since the ecclesiastical reforms under Peter I,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has been placed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secular power and helped maintain the Soviet regime. That is the reason why some people questione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s King plus Pope”. But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did not recognize either of these claims, and the book titled Social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published in 2000, aims to dispel those doubts.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does not gain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by using the aid of secular power, otherwise it loses its existence value for the secular power. The division of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division of its jurisdic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consistent with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of secular countries, which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impracticality of the religion of King plus Pope.

Keywords: Orthodox; religious institution; third Roma; Russia